

## 书吧



《一颗糖丸的奥秘》书封

拿到还散发着墨香的《一颗糖丸的奥秘》绘本,我有些激动。封面绘图上的顾方舟慈祥地站在孩子们中间,那俊朗的、极富感染力的样子,仿佛就在我面前。

1955年,江苏南通暴发大规模的脊髓灰质炎(以下简称脊灰)疫情,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466人死亡,随后疫情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危难之际,31岁的顾方舟担起重任,开始对发病机理不清、防治途径不明的脊灰进行研究。不久,他带领团队首次用猴肾组织培养技术分离出病毒,为预防脊灰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流行病学资料。

为控制脊灰疫情的蔓延,1958年,在获悉美国脊灰死疫苗上市的讯息之后,国家多部委决定由中国医学科学院

## 造一艘“方舟” 树一座丰碑

●刘静

牵头,在云南昆明投资兴建脊灰死疫苗生产基地。

随后,以顾方舟为带头人的四人考察组被派往苏联学习考察死疫苗制备工艺。仅仅数月,顾方舟就敏锐地发现死疫苗在中国生产是一条不可行的路,他坚定地主张走活疫苗技术路线……

他的非凡胆识,实在令人敬佩!

1960年,为解决庞大人口对脊灰疫苗的需求,原卫生部决定将全国脊灰活疫苗的生产基地由北京转移到昆明。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阶段,各地基建工程纷纷停办,疫苗基地也处于准备下马的境地。原卫生部委派的专家考察组也不认可,因为这里连自来水、24小时供电等最起码的基础条件都不具备。

专家组焦灼地询问顾方舟的意见:疫苗基地何去何从?顾方舟坚定主张并立下军令状:不仅不能下马,而且要加快建设。而实现奇迹靠什么?三个字——豁出去!顾方舟不仅自己豁出去了,还“豁”出了一家三代,他将全家连同古稀

之年的老母亲从北京迁到昆明玉案山。

在条件异常艰苦的大山里,他带领全所职工筚路蓝缕,没有住房就住在山洞,没有蔬菜自己种,没有道路自己修,甚至孩子们没有学上,他们就自己办起小学、自己当老师。当疫苗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他不仅义无反顾地以身试“毒”,还瞒着妻子“豁”出了刚满月的儿子……

这就是顾方舟精神——国家至上的家国情怀、求真务实的学者风范、不畏艰苦的革命意志、舍身奠基的高尚情操……他为我们树起了一座令人敬仰的人民科学家的丰碑,成为我们的楷模。

作为受其恩惠的那一代人,我由衷地感怀。记得有一次对顾老进行访谈,他在全面回顾“糖丸”研发的艰难过程后语重心长地说:“能在中国彻底消灭脊髓灰质炎,这不是我个人的功劳,这是国家的高度重视,是一个研究所科研人员的努力,我们整整贡献了三代人啊!”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守初心、担使

命”,我们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需要人民科学家精神,需要它爆发出更强大的时代感召力和引领力,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汇聚磅礴力量。

《一颗糖丸的奥秘》不仅为我们讲述了顾方舟严谨的科学精神,而且内容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帮助孩子们一步步了解科学的研究的神奇和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 顾方舟(1926—2019)

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院长。在中国首次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成功研制出脊灰活疫苗和脊灰糖丸活疫苗,让无数儿童免于致残,为我国最终实现全面消灭脊灰作出巨大贡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顾方舟夫妇与女儿顾晓曼合影。

## 父亲:我心中永远的谦谦君子

●顾晓曼

早上起床,看到书桌上那本《一颗糖丸的奥秘》的书籍,我捧在手里,深吸一口带着墨香的气息……父亲,您可安好?

读着这本书,我想起了父亲送给我的书——《使命的召唤》,这是2006年6月(正值父亲八十寿辰)他所在单位和他的学生们为他出版的一本纪念画册。

他在送给我的这本画册扉页上,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小曼,这本画册记录了你爸的一生。送你八个大字: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爸实践了一辈子,但也没有做好。望你牢记这八个大字,深入理解这八个字的含义,努力实践这八个字,使自己成为一个忠于国家、孝顺父母、仁爱众人、讲求信义、和平的君子。我们共勉吧。”

2019年8月,父亲过世几个月之后,我偶然再次翻开这本画册,惊讶地

“发现”了他当年留给我的这些文字,读完不禁泪目。

年轻时我曾经很不理解父亲,觉得他总是为别人考虑、自己吃亏,他常讲的一些“大道理”我也听不进去。慢慢地,经历了生活沉淀之后我才懂得,父亲一生忠诚于国家和人民,执着于他热爱的医学事业,淡泊名利,朴实无华。他终其一生努力践行的君子品行,在当下这个社会是多么难能可贵,这是他留给我的最珍贵的财富!

2019年1月,在父亲的告别仪式上,我献上的悼词是:“您是我心中永远的谦谦君子!”这是我对父亲最深刻的感受。

在我心中,父亲是一个心怀大爱、以“无我”之精神利他人的“君子”。在每一次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时,父亲总是从“他人”出发,始终把“自我”放在最后。

大学毕业时,父亲本可以去做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待遇好、地位高,但他却选择了一条很少人走的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

父亲说:“医生的天职是救人,救的人越多越好,一名外科医生一辈子救治的病人数量是有限的,而公共卫生事业却能让千千万万人受益,值得!”每次谈及此事,父亲都会像小孩子一样得意,觉得他的选择更“划算”,而在他的“账本”上,唯独没有的是“个人名利”这一项。

在昆明领导疫苗的研制和生产任务时,由于工作和生活环境过于恶劣,年轻的科研人员都不愿留下来。为了稳定军

心,父亲身先士卒,携全家迁往昆明。1964年,父亲放弃了北京户口,带着奶奶、妈妈、大哥,全家人从北京搬到了昆明玉案山。

由于山上的生活条件艰苦,营养跟不上,我的奶奶到玉案山后的第三年就因病去世了。1965年,我的二哥出生在玉案山,我的两个哥哥在玉案山上度过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由于山上缺乏教育资源,他俩也因此错过了像城市孩子那样接受良好基础教育的机会。父亲为此一直觉得愧对我的哥哥们。

在昆明的疫苗基地,像父亲这样三代人都工作、生活在大山里的科研人员还有很多。2010年,在昆明疫苗基地建成50周年纪念大会上,父亲对老同事们说:“为了疫苗,我们奉献了整整三代人!”大家听了无不感动、落泪。

今天,我很想对父亲说:“亲爱的爸爸,我懂您!您的要求我一定会努力做到!”相信父亲在时空的彼岸一定能听到我的回答。

爸爸,我永远爱您!